

国际援助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进展^{*}

万广华 朱美华

摘要:国际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援助的不断攀升,援助的社会经济效果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聚焦官方援助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减贫、就业、福利和移民方面展开。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增长论”、“其他因素影响论”和“无因果关系论”三种论断。关于援助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角度展开。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有互补和替代关系,且存在“基础设施效应”、“先锋效应”、“荷兰病效应”和“寻租效应”四种影响渠道。援助的减贫效果则受不平等程度、制度政策、援助形式和分配模式影响;援助可以增加就业;援助的福利效果存在“转移悖论”;援助对非法移民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本文最后提出有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并简要总结关于中国对外援助效果的研究,得出政策启示。本文认为,关注官方援助的效果,及时调整援助方式和政策,是提高援助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国际援助 官方援助 经济增长 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减贫

一、引言

国际援助是典型的跨学科议题,备受发展经济学、外交关系、地缘政治、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的重视。同时,国际援助的力度不断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 年仅官方援助总额就已经接近 1600 亿美元,高于世界上 120 多个欠发达国家各自的 GDP 总量。长期以来,中国既是援助国,又是受援国,尤其是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大量增加对外援助,同时得到的双边和多边援助不断减少,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遗憾的是,中国关于国际援助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规范性的成果刚刚开始出现。随着国际政治经济重心继续东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演进,国际援助无疑会继续攀升,其影响也可能因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力介入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些都呼唤学术界,包括中国的经济学界,充分关注国际援助的研究。

根据 OECD 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应当满足下述三个条件:(1)由出资国官方政府机构提供;(2)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类福祉;(3)赠予至少占到发展援助总额的 25%,贷款条件优惠。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即 AfT)根据用途可以分为三类:对于贸易政策和监管的援助、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和对于生产部门的援助。援助的动机主要可以分为援助国的目标和受援国的需要两方面,而援助的目标包括经济目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受援国的需要包括经济增长和减贫(McKinley & Little,1979;Alesina & Dollar,2000;Burnside & Dollar,2000;Frey & Schneider,1986)。

在早期(20 世纪 50 年代),援助机构的工作受到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的强烈影响,很多机构资助了较大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忽视了与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相

^{*} 万广华,朱美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guanghuawan@yahoo.com;17210680073@fudan.edu.cn。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71833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与治理研究”(71834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福利函数的贫困识别、度量和应用研究”(71703088)。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和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关的政策、项目和计划。随着对外援助资金不断攀升,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使致力于弥补投资不足的理论遭受质疑,取而代之的观点强调边际收益递减是援助效果欠佳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索洛模型关注生产率,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应地,新的援助理念主张将提高教育水平作为援助的主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拉美国家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并引发债务危机,这催生了援助研究领域的另一种观点:在政策质量好的国家,援助的有效性更高(Burnside & Dollar,2000)。冷战结束后到90年代末,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下降到最低点。进入21世纪,全球发展失衡日益严重,援助理念重新关注贸易和生产,受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推动,官方援助又开始增加(Edwards,2015)。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对援助有效性的文献进行总结评论,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减贫、就业、福利和移民等方面展开,然后提出有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并简要提及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最后得出政策启示。

二、国际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国际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尽管国际援助可以通过促进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有一些文献是直接研究国际援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部分将对此进行简述。而关于国际援助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将在接下来的两部分分别进行介绍。

(一)增长论

一方面,外来援助可以促进投资和固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增长率(Levy,1988;Hansen & Tarp,2001)。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援助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信息传递(吴辉航、白玉,2018),吸引FDI(Donaubauer et al,2016;Dong & Fan,2017),后者可以以研发、营销的形式促进知识传播,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Kosack & Tobin(2006)研究发现,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与受援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呈正相关。Minoiu & Reddy(2010)研究指出,长期来看,发展援助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

但援助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技术水平不变,那么投资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援助占受援国产出的比例超过一个阈值后,援助对产出增长率的边际影响由正向影响变为负向影响,这被称为“援助的拉弗曲线模型”(aid Laffer curve model),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Lensink & White(2001)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1975—1992年间111个受援国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援助/GNP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其他因素影响论

1. 援助的有效性受受援国的政策、自然条件及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在拥有“好政策”的国家,援助的有效性更高,这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好政策”包括财政盈余、贸易开放以及维持物价稳定等(Burnside & Dollar,2000;Easterly & Pfutze,2008)。因为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不同,受援国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决定援助能否被有效吸收利用。Burnside & Dollar(2000)利用1970—1993年间5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研究援助的效果,将影响援助流动的政治因素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援助与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援助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相对于政策不好的国家,政策质量好的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0.18个百分点。Easterly et al(2004)则对Burnside & Dollar(2000)的研究进行了质疑。他们使用更多国家更多年份的数据研究发现,援助与政策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援助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针对此质疑,Burnside & Dollar(2004)进行了回复,交互项不显著是由于数据含有异常值,而二次项显著为正则可能反映了援助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Collier & Dollar(2004)也基于含有援助和政策交互项的线性模型,通过使用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发现,在政策好的国家,援助每增加1%,投资额外增加0.

9个百分点,但是影响是递减的,从而得出援助不要集中在最贫穷国家的建议。

Mosley et al(1987)研究指出,援助在一些受援国有持续性刺激作用,而在另一些受援国的作用是中性的甚至是负面的,这与政府对援助资金的使用有关。如果援助伴随政府规模扩大、消费增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大(Temple & Van de Sijpe,2017)。Collier & Hoeffler(2004)利用1974—1997年间1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战后的援助和政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ODA占GDP的比重代表援助,以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指数(CPIA)衡量政府政策质量,研究发现,在政策质量好的国家,援助对GDP增长率的影响高0.15个百分点。因此,发生冲突或战争之后,好政策有利于经济恢复。但是,援助并不能促使政府采取好的经济政策(Burnside & Dollar,2000),反而可能会导致“寻租”行为增加,腐败蔓延(Knack,2001,2004;Djankov et al,2008;Tavares,2003)。

另一方面,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越差,受援国越易受到冲击,不利于经济增长(Dawe,1996;Guillaumont et al,1999;Ramey & Ramey,1995),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对于遭受冲击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更大的边际贡献。Collier & Dehn(2001)就指出,当受援国面临出口商品价格负面冲击时,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外汇流入波动,从而缓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增加对面临负面冲击国家的援助比增加对拥有“好政策”国家的援助更有效。但是Dalgaard et al(2004)使用滞后一期的援助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一国土地处于热带地区的比例作为自然气候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发现,援助总体上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的大小受气候影响,气候环境越差,援助的有效性越低。

最后,Guillaumont & Chauvet(2001)通过对上述两种模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结论:要基于自身环境来评价援助的效果。在此原则下,当政策质量相同时,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更差的国家应得到更多援助;当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相同时,政策质量更好的国家应得到更多援助。

2. 援助的有效性受援助质量和援助国的政策影响。使用来自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援助国表现指数对援助数据进行调整,Minasyan et al(2017)研究发现,分配给腐败国家的援助欠缺有效性;如果援助带有附加条件,则会导致受援国的交易成本和行政负担增加,援助的有效价值也会下降;只有高质量援助与人均GDP正相关。据Kihara(2012)的研究,由于援助的排他性,日本的援助表现指数被排在22个OECD援助国中的最后一位,然而受援国人均GDP增长率和来自日本的附加条件援助之间的相关性,比来自其他国家无条件援助的相关性更高,这说明日本的附加条件援助效果更好。

援助碎片化正越发引起关注。Frot & Santiso(2008)研究指出,1960年每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到少于两个援助国的援助,然而2006年该平均数超过了28。援助碎片化增加了受援国的交易成本(Acharya et al,2006)和援助国的行政成本(Anderson,2012),降低了援助的价值。随着援助国在援助市场上的占比下降,援助国雇用的专门管理援助项目的官员的数量也发生了下降,这意味着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减少,每个人的控制权加大,政策质量将会下降,腐败增强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Knack & Rahman,2007;Djankov et al,2009)。

实施与援助政策互补的非援助政策有利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Minasyan & Nunnenkamp(2016)将汇款额作为工人流动性和移民的代理变量,由援助国汇回的汇款额越高,表明援助国对工人流动和移民的态度更加开放,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强。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简称CGD)提出从贸易、移民、投资、环境、科技、资金援助和安保七个方面衡量援助政策的一致性。Gary & Maurel(2015)研究指出,援助政策不应局限于资金支持,还应包括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他们使用2003—2010年间22个OECD援助国和81个受援国的数据,利用CGD提供的发展承诺指数(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DI)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越有利。此外,Knack(2013)和Dreher et al(2015)认为,援助国与受援国的政治距离和意识形态差异会通过破坏信任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援助的有效性。Minoiu & Reddy(2010)通过检验援助的长期影响发现,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给予的援助对于受援国长期发展具有抑制作用。Kilby & Dreher(2010)也提出,相对于以援助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为动机的

援助,以受援国需要为动机的援助对于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更有效。

(三)无因果关系论

无因果关系论认为,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方面无效,因为援助既不会显著增加投资(Dollar & Easterly,1999;Boone,1996),也不会使穷人受益(Rajan & Subramanian,2005),却会增加政府规模(Boone,1996)。Friedman(1958)研究指出,美国对外援助并没有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因为援助资金被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但是在使用时浪费严重。Rajan & Subramanian(2008)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援助在更好的政策环境中更有效。这似乎印证了Deaton(2013)的观点:当穷国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它不需要援助。而对于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国家,国际援助是无效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那么是什么机制导致援助失效呢?首先,如果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使该国的储蓄率降低或者使资本/产出比率提高,那么援助将不利于受援国的发展(Griffin,1978)。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出口是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而援助可能导致受援国汇率升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部门的份额降低,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收到更多援助的国家,劳动密集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更慢,这可能会加剧不平等(Rajan & Subramanian,2005)。

其次,如果援助被要求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增加,援助有效性降低(Aryeetey et al,2003)。对于援助国来说,附加条件往往扭曲了激励机制,在现实中也很难严格执行,反而会削弱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信任(Easterly,2003);对于受援国来说,发达国家的援助条件剥夺了受援国的政策自主权,受援国无法以主人翁的角色去主导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失去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郑宇,2017)。

最后,碎片化削弱了援助国追求发展目标的动机。一个特定的援助国通过增加其在援助市场上的份额不一定能增加对受援国的杠杆作用(Munro,2005)。依赖于一个或几个关键的援助国,除了可能丧失政策自主性外,还可能面临一个更有风险性的援助环境,具有垄断力量的援助国可能会利用垄断力量附加更多条件(Frot & Santiso,2009;Easterly,2002)。而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在援助市场上有更大份额的援助国,有更大的相容利益(Knack & Rahman,2007),也有更强的动机去最大化援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不是追求商业或非发展性目标,所以这些国家不太可能一直实施损害援助有效性的行动(Acharya et al,2006;Knack & Rahman,2007),从而附加更少的条件(Knack & Smets,2013)。虽然援助碎片化可以近似反映援助国之间更大的市场竞争,对受援国有利(Rogerson,2005;Frot & Santiso,2009),但是如果有大量的援助国参与,每个援助国只提供一小部分发展援助,那么责任就会比较分散。援助国越多,越容易觉得援助对于促进发展无效是因为其他援助国的错误。如果援助国有多个目标,集体行动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就会加重(Acharya et al,2006;Kimura et al,2012)。因此,受援国应该权衡从援助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的好处和援助碎片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Rogerson,2005)。

三、国际援助对贸易的影响

有关援助对贸易的影响可从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对援助国来讲,附加条件的援助对进口的要求直接增加了贸易,而无条件援助则可以通过树立援助国的良好形象使之受益(Arvin & Choudhry,1997)。另一方面,对受援国来说,促贸援助(AfT)不仅能直接增加进出口(Hühne et al,2014a; Martínez-Zarzoso et al,2017),还能降低交易成本,进而间接影响贸易(Helble et al,2012;Cali & TeVelde,2011; Vijil & Wagner,2012),也会影响出口多样性(Hühne et al,2014b;Gnangnon,2018)。此外,现有研究在官方发展援助(ODA)对于受援国贸易的影响上也各执己见。有的观点认为,ODA通过改善贸易关系和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促进其出口(Pettersson & Johansson,2013;Osakwe,2007),或者通过增强受援国的购买力增加其进口(Kruse & Martínez-Zarzoso,2016)。也有观点认为,由于“荷兰病”问题,ODA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无效(Arellano et al,

2009;Kang et al,2012)。就研究方法而言,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Anderson & van Wincoop, 2003)被广泛用于援助的贸易影响评估,常用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规模、人口、基础设施、贸易成本、距离和语言等。

(一)国际援助对援助国贸易的影响

援助国的出口商可能是援助的主要受益者。影响机制有两种,如果援助国提供附加条件的援助,规定援助资金的用途,这将直接要求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制造商合作(Svensson, 2000);如果援助国提供无条件的援助,这可以帮助援助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增进双边关系,也能促进其出口(Arvin & Choudhry,1997)。因此,Arvin & Baum(1997)认为援助国应该保持稳定的无条件援助以维持形象,同时随着时间变化调整有附加条件的援助,以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

2001年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DAC)发布巴黎公告,建议成员国除了提供食物援助、技术援助和通过NGO提供援助外,应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无条件援助。因此,DAC援助国的无条件援助份额有了大幅度上升(Clay et al,2009)。无条件援助在评价援助国的表现时越来越重要(Easterly & Williamson,2011)。

Silva & Nelson(2012)研究发现,援助确实会增加援助国向受援国的出口,Nowak-Lehmann et al(2009)也发现,德国的对外援助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欧盟其他国家相同受援国的援助会挤出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Martínez-Zarzoso et al(2009)利用1962—2005年间德国和138个受援国的数据,使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从长期来看,德国对外援助1美元,可带来1.4美元的出口。Wagner(2003)研究指出,援助可以产生133%的回报,也就是说,如果援助国援助1美元,与援助项目直接相关的商品出口将带来35美分的回报,与援助项目不直接相关的商品出口将带来98美分的回报。Johansson & Pettersson(2009)使用1990—2005年间184个国家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外国援助会增加援助国与受援国的贸易,但AfT的影响是微小的,完全可由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来解释。

(二)促贸援助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

1. 直接影响。有趣的是,促贸援助(AfT)对受援国出口也有显著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贸易自由化方面障碍重重,所以AfT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Hoekman & Prowse,2005)。从多边贸易的角度看,AfT会增加受援国向援助国的出口,也会增加受援国从援助国的进口,但是出口往往大于进口。Hühne et al(2014)通过分析1990—2010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所有成员国的数据发现,援助每增加1%,受援国向所有援助国的总出口增加5%,从援助国的总进口增加3%。实际上,AfT是否促进受援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援助国的不同而有差异。2001—2006年间,日本支持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以及挪威支持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和高需求”产业的方案在加强受援国出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德国的AfT计划一直无效,Brazys(2013)认为这是因为其设计缺乏对出口的关注。

不同类别的AfT对出口的影响可能不同。Martínez-Zarzoso et al(2017)利用2000—2011年间124个受援国的数据,将滞后两期的AfT作为解释变量,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援助对受援国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从0.10分位数到0.75分位数,援助对受援国出口的边际影响由5.2%下降到1.5%,这说明从AfT受益更多的是出口较少的国家。在所有分位数上,对于贸易政策和监管的援助都可以促进受援国出口,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只能促进0.10~0.35分位数上的出口,对于生产部门的援助只能促进0.10~0.50分位数上的出口。Lemi(2017)基于2002—2012年间50个非洲受援国、27个OECD援助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援助每增加1%,非洲受援国从OECD援助国进口增加11%,向OECD援助国出口增加2.3%;分类来看,只有教育培训援助才会增加非洲向OECD国家的净出口。

2. 间接影响。AfT也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减少其他贸易障碍对受援国出口产生间接影响。与贸易政策和监管相关的援助打破了贸易监管瓶颈、降低了行政成本,促进了出口(Helble et al,

2012; Cali & TeVelde, 2011)。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援助, 比如交通设施援助, 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 使得贸易更加便利化 (Cali & TeVelde, 2011; Vijil & Wagner, 2012; Pettersson & Johansson, 2013)。对于生产部门的教育培训援助和技术援助提高了生产效率, 增加了受援国的出口 (Brenton & von Uexkull, 2009)。

3. 出口多样性。AfT 也会影响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初级产品出口依赖是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主要问题, Hühne et al (2014a) 通过估算引力模型发现, AfT 在促进受援国制成品出口方面是有效的, 而对初级产品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 这说明 AfT 确实对于促进受援国出口升级和多样化做出了贡献。Gnangnon (2018) 利用 2002—2015 年间 104 个受援国的数据, 估算赫芬达尔指数 (HHI 指数) 发现, 随着 AfT 实际支付量和累计支付量的增加, HHI 指数下降, 出口多样性增加, 而多样化能扩大外贸伙伴的数量, 同时也能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Gnangnon & Roberts (2015, 2017) 研究指出, AfT 不仅能促进受援国出口多样化, 还能改善出口产品质量。Kim (2017) 利用 1996—2013 年间 133 个受援国的数据, 从短期和长期视角进行分析发现, 援助在短期内减少了出口产品集中度, 但是在长期, 援助总体上对于出口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三) 官方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官方发展援助 (ODA) 对受援国贸易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 ODA 和受援国出口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Johansson & Pettersson, 2009; Pettersson & Johansson, 2013)。Pettersson & Johansson (2013) 研究发现, 紧密的援助关系拉近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距离”, 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贸易成本, 从而促进受援国向援助国出口, 其中, 重要原材料的出口受益最大。如果将外国援助视为收入转让, 援助使受援国的预算约束线向外移动, 购买力增加, 从而导致进口增加 (Kruse & Martínez-Zarzoso, 2016)。但是当 ODA 超过一个阈值, 援助倾向于阻碍贸易而不是促进贸易 (Elbadawi, 1999)。对于非洲来说, 援助、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都会影响受援国的出口多样性 (Osakwe, 2007)。外国援助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 不超过一国 GDP 的 20% 的国际援助显著促进了出口多样化, 而超过 GDP 的 20% 的援助显著阻碍了出口多样化。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 援助占 GDP 的比重低于 20%, 这意味着在许多低收入国家, 可以使用额外援助来加强出口多样化 (Munemo, 2011)。另一些研究指出, 受援国的进出口企业并没有受益于援助带来的贸易关系的改善。Nowak-Lehmann et al (2013) 使用 1988—2007 年间 123 个受援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双边援助每增加 1%, 援助国出口增加 5%, 而受援国向援助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投资增加的积极影响被储蓄减少、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抵消了。Liu & Tang (2018) 研究发现, 中美对非援助的影响有所不同, 中国援助对中非双边进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而美国援助对于美国向非洲出口有积极影响, 对美国从非洲的进口并没有显著影响。

如果援助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无效, 这往往可以由“荷兰病”来解释。“荷兰病”指援助导致受援国实际汇率上升, 在一段时间内出口量降低, 贸易部门规模减小,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Arellano et al (2009) 就发现, 援助会增加消费, 使汇率上升, 贸易部门缩小。Kang et al (2012) 还研究发现, 随着汇率升值, 援助对受援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减弱。由于援助项目的周期性以及“荷兰病”问题 (Tressel & Prati, 2006; Rajan & Subramanian, 2011), 波动性比较大的援助可能会损害受援国。但是, 援助、实际汇率和受援国出口及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Suwa-Eisenmann & Verdier (2007) 就指出, 技术援助通常可以减轻由“荷兰病”引发的实际汇率升值的影响, 因为需要向外国咨询人员支付资金。从长期来看, Adam & Bevan (2006) 研究发现, 援助对产出增加的影响超过“荷兰病”抑制出口的影响。

四、国际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之间既具有互补性, 也具有替代性。而援助对 FDI 的影响渠道可划分为四种渠道, 它们分别是“基础设施效应”、“先锋效应”、“荷兰病效应”和

“寻租效应”。

(一)援助和 FDI 之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

援助和 FDI 之间具有互补性。Yasin(2005)基于 1990—2003 年间撒哈拉以南 11 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双边援助对于 FDI 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这一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重要政策含义是,改善与援助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FDI 流入。Garriga & Phillips(2014)通过研究发生冲突之后的国家在 1973—2008 年的数据发现,援助对 FDI 流入有促进作用。Anyanwu(2012)分析了 1996—2008 年间 53 个非洲国家的数据,结果表明,就援助流入越多的国家而言,其 FDI 流入也越多。Arazmuradov(2012)研究发现,在中亚内陆的 5 个转型经济体,援助和 FDI 有互补关系。

但是,援助和 FDI 之间也具有替代性。Alesina & Dollar(2000)研究指出,因为高收入国家有更大的市场,所以私人投资倾向于流向收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得援助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吸引的私人投资越少。

此外,援助和 FDI 之间可以同时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Selaya & Sunesen(2012)研究指出,不同用途的援助对于 FDI 的影响不同,如果援助被用于投资辅助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会吸引 FDI;如果援助被直接用于生产过程,则会挤出 FDI,因此,外国援助的用途构成对其整体效率水平很重要。Kristjánssdóttir(2006)利用 1970—2004 年间的 GDP、总人口和 FDI 等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重债穷国,随着收入增加,援助和 FDI 由互补关系变为替代关系。

(二)四种效应

1. 通过改善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产生的正向“基础设施效应”。基础设施效应指用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从而吸引 FDI。Donaubauer et al(2016)利用 1990—2010 年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用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对于吸引 FDI 不仅有直接效应,即外国投资者预期基础设施在未来能为其提供很好的服务,还可以通过改善受援国的交通、通讯、能源和金融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 FDI。类似地,Kapfer et al(2007)使用 1982—1995 年间 52 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援助和 FDI 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总体上援助对 FDI 的流入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如通信、交通和能源等生产项目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此外,在一些教育比较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教育质量并不能满足投资要求。但 Donaubauer et al(2014)通过分析 1984—2008 年间 21 个拉美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对于教育的援助可以吸引 FDI。Bhavan et al(2011)研究了南亚经济体的情况也发现,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援助可以促进 FDI 流入。而 Hien(2008)使用 2002—2004 年间越南 64 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基础设施的援助不仅直接影响 FDI,还通过影响人力资本间接影响 FDI。运输设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包括电力、水和天然气在内的生产设施建设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生产,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有机会增加收入和消费。这些都可能扩大跨国公司的市场规模。此外,更多的学校和医疗资源对人力资本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为投资者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2. 通过吸引来自援助国本国而非其他国家的 FDI 产生的正向“先锋效应”。先锋效应(vanguard effect)指援助能促进来自援助国本国的 FDI,但是不一定能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 FDI,这与以下几个原因相关:有关受援国当地业务及环境的信息可以专属地传达给援助国的公司;通过实施援助活动,投资者可以收集关于受援国的信息;援助会改善投资商对受援国投资风险的评估;援助有时可以将援助国的商业规则带入受援国。所有这些对于 FDI 流动非常重要(Mody et al,2003)。Kimura & Todo(2010)利用 1990—2002 年间法、德、日、英、美五个援助国和 98 个中低收入国家(按 1990 年世行分类)的数据研究了援助对 FDI 的影响,使用滞后一期的 ODA 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构造 ODA 与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检验“先锋效应”发现,来自所有援助国的 ODA 总量对进入受援国的外资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只有日本援助的“先锋效应”是稳健的。日本在东亚六个国家(中国、韩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投资的6%受其援助影响。Blaise(2005)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研究也表明,1980—1999年间日本的对华援助对日本私人投资者在华选址有显著的积极影响。Carro & Larrú(2010)通过研究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发现援助和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日本对巴西的援助对日本投资有“先锋效应”。

3. 通过扭曲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资源分配产生的负面“荷兰病效应”。Arellano et al(2009)研究发现,援助增加了消费而不是投资,大规模的援助导致更高的汇率和更小的贸易部门,不利于FDI流入。Beladi & Oladi(2006)构建了一个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包含进出口两个贸易部门和一个非贸易公共部门。一般的情况是,假定FDI可被用于进出口部门和公共部门,被用于生产公共部门产品的援助将会增加公共消费品的生产,公共部门扩大,要素将从贸易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如果贸易部门比公共部门的资本更加密集,那么从贸易部门流出的资本将会多于公共部门需要的资本。假定国内资本固定,国外流入的资本可变,那么外国投资将会减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援助会挤出FDI。

4. 通过鼓励非生产性寻租行为产生的负面“寻租效应”。寻租行为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活动来影响援助的使用。Economides et al(2008)利用75个受援国的混合截面数据,同时考察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寻租效应”发现,寻租行为会减弱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利于FDI流入。在公共部门相对更大的国家,寻租行为的消极影响更大。Harms & Lutz(2006)利用1988—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平均来看,援助对FDI的边际影响接近于零,但在监管严格的国家,援助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大。Karakaplan et al(2005)通过分析1960—2004年间97个欠发达国家的发现,在政府质量高和金融市场发展良好的环境下,援助能促进FDI流入,但在其他环境下不一定如此。

五、国际援助与发展相关议题

(一)减贫效果

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减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中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目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年近35.9%的人生活在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线以下,到2015年该比重为9.9%。尽管总体上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有所上升(Chen & Ravallion,2007)。现有文献多以贫困发生率(poverty headcount)、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贫困缺口(poverty gap)或贫困缺口的平方(poverty squared gap)来衡量贫困水平。

理论上可以证明,贫困由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决定。高速度、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Ravallion & Chen,1997;Besley & Burgess,2003;Dollar & Kraay,2002,2004),援助的减贫效果也依赖于受援国的不平等程度(Bahmani-Oskooee & Oyolola,2009)。因为贫困发生率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函数,即使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如果不均等大幅度增加,贫困率可能仍然保持不变甚至上升。

即使控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援助对减贫也可能具有直接影响。Alvi & Senbeta(2012)使用1981—2004年间人均1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和7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以贫困发生率(poverty headcount)还是以贫困差距(poverty gap)或者贫困差距的平方(poverty squared gap)来衡量贫困水平,OD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Pettersson(2007)以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来衡量贫困水平,利用1978—2001年间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ODA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婴儿死亡率平均降低1.3%,但是结果并不稳健。

减贫效果受到接受国的制度和政策影响。援助可能会帮助降低具有良好制度和政策国家的贫困水平(Burnside & Dollar,1998),提高民主体制下受援国的生活质量,但对于非民主国家没有影响(Kosack,2003)。Alvi & Senbeta(2012)还研究发现,一国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增强援助的减贫

效果。足够多并且足够好的政府监管对于援助的减贫效果也有正向影响(Grindle, 2004)。Mosley et al(2004)使用联立方程,将援助、贫困、政府扶贫支出同时作为因变量,使用GMM估计发现,援助增加会使政府扶贫支出上升,而扶贫支出影响减贫效果,因此,援助国应该采取灵活的政策来提高援助对扶贫支出的促进作用。

援助应被分配给有“好政策”的穷国的观点建立在以下逻辑上:好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减贫依赖于经济增长。但Lensink & White(2000)不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援助并不只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影响贫困,还可以通过改善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来减少贫困。此外,侨汇回流在短期内可能比援助的减贫效果更好,因为它更直接地进入家庭收入,但是Kapur(2004)研究指出,解决结构性贫困还是需要外国援助。

减贫效果还受援助形式和分配模式的影响。Alvi & Senbeta(2012)研究发现,多边援助和赠予比双边援助和贷款的减贫效果更好。Collier & Dollar(2002)认为,当援助的边际影响在受援国之间是相等的时候,这时援助的分配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实中的分配并不是最有效的,如果能实现有效分配,摆脱贫穷的穷人的数量将会翻倍。Oduor & Khainga(2009)研究发现,对于肯尼亚来说,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减贫是有效的,而且在最穷地区的效果好于贫穷程度较轻地区的效果。此外,Bourguignon & Platteau(2017)研究指出,援助资金的充裕程度也会影响减贫效果,援助国的援助资金越充足,援助有效性可能会越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国在选择受援国时可能会降低对受援国政府管理质量的标准。

但是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援助对于减贫是无效的。如Arvin & Barillas(2002)利用1975—1998年间1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在民主的发展中国家,ODA占GNP的比重和人均GNP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以婴儿死亡率、小学入学率和预期寿命来衡量贫困水平,结果也是类似的(杜旸, 2011; 熊青龙等, 2018)。Masud & Yontcheva(2005)利用1990—2001年间58个国家的数据,并使用戴维森—麦金农检验(Davidson & MacKinnon, 1993)检查自变量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双边援助对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Chong et al(2009)研究指出,援助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无效的。

(二)援助对就业、福利和移民的影响

理论上,援助可以改善受援国的营商环境,增强受援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实证上,Simpasa et al(2015)使用1990—2010年间非洲开发银行所实施项目的数据,检验用于不同部门的援助在创造就业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他们发现,生产部门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为小规模企业提供融资和信贷上,比健康和领域的项目产生更多的就业。但Page & Shimeles(2015)研究发现,近年来流入教育和健康等社会服务部门的援助占比增加,流入生产部门的援助占比下降,但援助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就业。Page & Söderbom(2015)通过分析非洲国家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虽然小企业迅速成长会增加就业,但是如果将企业死亡率考虑在内,中期来看,小企业和大企业创造的就业是相同的。因此,在援助时不应过分夸大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

福利的改善是衡量援助有效性的另一个角度。许多文献将援助视为公共产品(Dudley, 1979; Olson & Zeckhauser, 1966)。援助可以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受援国福利(Agénor & Yilmaz, 2013)。综合考虑援助对援助国和受援国福利的影响,通常可以得到“转移悖论”,即由于外部性、价格和附加条件等因素造成的扭曲,援助使援助国获利,而使受援国受损。Samuelson(1952, 1954)认为,当市场稳定时,“转移悖论”不可能发生。反过来,Bhagwati et al(1983)认为,只要市场有扭曲,“转移悖论”就会出现。Kemp & Kojima(1985)研究指出,“转移悖论”有可能是因为内生价格扭曲。Djajić et al(2004)研究发现,在两国两期模型、国际资本市场存在借贷障碍的假设下,虽然在第一期援助国受损、受援国获利,但是由于援助很可能通过影响生产率从而促进贸易、改变受援国消费者的偏好而影响消费,使得援助国在第二期获利,受援国受损。但两国的跨期福利函数受利率因素影响,“转移悖论”仍有可能发生。当援助国没有比受援国更差的产品,附加条件的

援助可能使援助国受损、受援国受益或发生帕累托改进(Abe & Takarada, 2005; Lahiri & Raimondos, 1995)。

在不同博弈策略下,附加条件和无条件援助对福利的影响不同。当援助国之间采取非合作策略时,更高排他性的援助(即附加条件援助),会增加受援国的社会福利。当援助国之间协调援助政策以最大化包括受援国福利在内的共同福利时,更低排他性的援助(即无条件援助),将会增加援助国的社会福利(Kim & Kim, 2016)。

此外,目的地和来源国之间的福利差异被认为是驱动移民的根本力量。所以,援助已经被作为一种措施,促进移民来源国的发展,从而减少经济移民(Todaro & Maruszko, 1987; Faini & Venturini, 1993)。援助对非法移民有两种影响:一是它缩小了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收入差距,降低非法移民的数量。二是受援国收入增加,边际效用降低,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移民成本代表的效用相对下降,从而增加非法移民的流量(Gaytan-Fregoso & Lahiri, 2000)。

六、总结及启示

(一) 现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目前研究国际援助有效性的文献不少,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第一,研究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文献较少,主要原因是数据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公布其官方对外援助数据,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研究受到限制。

第二,现有文献研究援助对贸易的影响时大多只考虑经济因素,比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程度等,往往忽略了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另外,已有文献指出了援助国之间的异质性影响 AfT 的效果,那么这种异质性是否也影响 ODA 的贸易效果呢?此外,援助对贫困的影响可能不是当期的,需要考虑滞后效应。短期和中长期影响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短期,援助的减贫效果可能不明显,在中长期,援助可能通过政治制度建设和能力培养影响贫困。

此外,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援助对受援国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援助国在进行援助时,不仅怀有经济动机,还可能怀有政治动机,但是关于援助的政治影响的研究较少;贷款援助和赠予援助的影响可能不同,在不同国家,哪种援助形式更加有效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当前援助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本文提到的“荷兰病”、碎片化、激励机制的扭曲等。如何构建一种新型援助模式来解决援助的无效性问题,这也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对外援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处于摸索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变化很大,援助对象的选择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合作。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提供了大量援助,悄然影响着国际援助体系(Woods, 2008),逐渐形成了官方援助和商业参与相结合的独特的“中国模式”(Morgan & Zheng, 2019)。中国对外援助以双边援助为主(Lengauer, 2011),主要由政府提供,依赖于官方渠道(Opoku-Mensah, 2009)。中国的官方援助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符合 OECD 标准的高度优惠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ODA),另一部分是提供更高利息或者更少补助的其他官方融资项目(OOF)。Bräutigam(2011)研究指出,中国的援助是发展性的,中国确实提供符合官方发展援助定义的资金,但只占官方融资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比重。Kurlantzick(2006)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会减免贷款偿还数量。

针对中国长期对非的大量援助,西方有部分声音认为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Larmer, 2017)。但事实上,中国是为了双赢合作。Taylor(2009)研究指出,作为合作伙伴,中国与非洲的长期利益相吻合。一方面,援助促进了贸易。Sautman & Hairong(2007)认为,援助促进了中国企业与非洲的合作,中国向非洲出口大量机器、电子设备等高科技产品,这些产品比从西方进口和当地生产便宜,这使穷人和消费者受益,减轻了非洲对西方的依赖。另一方面,援助推动了投资。Morgan & Zheng

(2018)通过分析 1956—1999 年间中国实施的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发现,中国过去对外援助与当代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胡兵等(2015)研究指出,中国对外援助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其效应在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更为明显。Dong & Fan(2017)的研究表明,流入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而流入生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会挤出中国投资。张汉林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降低对外援助占 GDP 的比重,同时增加对外投资占 GDP 的比重。此外,与传统援助国对外援助失败(Moyo,2009)相反,Babaci-Wilhite et al(2013)认为中国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Pehnelt(2007)也认为,西方国家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并未促进其经济增长或减少贫困,而中国对外援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增加了援助国之间的竞争,从而有利于提高援助效率。Meyersson et al(2008)研究了对外援助对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对于非洲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出口每增加 1%,一年 GDP 增长率提升 0.2%,三年 GDP 增长率提升 0.7%,这要大于出口到美国和印度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同样是促进了贸易的援助,中国的援助给非洲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好。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Bräutigam(2011)研究发现,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中国还向非洲派送了大量的医务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教师,为非洲修建铁路、通信设施、医院、学校和大坝提供了大量劳动力。Sautman & Hairong(2007)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参与的对非援助项目所得到的回报率是低于西方国家的。Pehnelt(2007)研究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比西方国家公民更愿意在国外工作,这使得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相对于西方国家具有成本优势。

基于文献综述,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援助的有效性。首先,合理安排援助用途。中国大部分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如果增加对于贸易政策监管的援助和对于生产部门的技术援助,援助的促贸效果可能更好。其次,灵活选择合作形式。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途径,中国应当因地制宜,两种途径相结合,提高援助效率。最后,谨慎选择援助对象。为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在环境条件相同时,应当对那些推行“好政策”的国家提供相对更多的援助。

参考文献:

- 杜畅,2011:《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国际政治研究》第 1 期。
- 胡兵 丁祥平 邓富华,2015:《中国对外援助能否推动对外投资》,《当代经济研究》第 1 期。
- 吴辉航 白玉,2018:《“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兼论通讯基础设施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熊青龙 郑欣 李凤娇,2018:《发展援助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际商务研究》第 6 期。
- 张汉林 袁佳 孔洋,2010:《中国对非洲 ODA 与 FDI 关联度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 11 期。
- 郑宇,2017:《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8 期。
- Abe, K. & Y. Takarada(2005), “Tied aid and welfa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5):964—972.
- Acharya, A. et al(2006), “Prolife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e value of ai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1):1—21.
- Adam, C. S. & D. L. Bevan(2006), “Aid and the supply side: Public investment, export performance, and Dutch diseas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2):261—290.
- Agénor, P. R. & D. Yilmaz(2013), “Aid allocation, growth and welfare with productive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18(2):103—127.
- Alesina, A. & D. Dollar(2000),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33—63.
- Alvi, E. & A. Senbeta(2012), “Does foreign aid reduce pover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4(8):955—976.
- Anderson, E. (2012), “Aid fragmentation and donor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Letters* 117(3):799—802.
- Anderson, J. E. & E. van Wincoop(2003),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

- conomic Review* 93(1):170—192.
- Anyanwu, J. C. (2012), “Why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 where it goes? New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Annals of Economics & Finance* 13(2):425—462.
- Arazmuradov, A. (2012), “Foreign ai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nexus in landlocked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Economic Research Guardian* 2(1):129—151.
- Arellano, C. et al(2009), “The dynamic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aid and its vari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1):87—102.
- Arvin, B. M. & C. F. Baum(1997), “Tied and untied foreign aid: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Keio Economic Studies* 34(2):71—79.
- Arvin, B. M. & F. Barillas(2002), “Foreign aid,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mocracy”, *Applied Economics* 34(17):2151—2156.
- Arvin, B. M. & S. A. Choudhry(1997), “Untied aid and exports: Do untied aid disbursements create goodwill for donor ex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8(1):9—22.
- Aryeetey, E. et al(2003), “Does tying aid make it more costly? A Ghanaian case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Rich Countries’ Policies on Poor Countries”.
- Babaci-Wilhite, Z. et al(2013), “China’s aid to Africa: Competitor or alternative to the OECD aid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40(8):729—743.
- Bahmani-Oskooee, M. & M. Oyolola(2009), “Poverty reduction and aid: Cross-country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9(5/6):264—273.
- Beladi, H. & R. Oladi(2006), “Does foreign aid impede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Study Paper, No. 332.
- Besley, T. & R. Burgess(2003), “Halving global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3—22.
- Bhagwati, J. N. et al(1983), “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transfers and welfare: Bilateral transfers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4):606—618.
- Bhavan, T. et al(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FDI in South Asia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2):143—149.
- Blaise, S. (2005), “On the link between Japanese ODA and FDI in China: A microeconomic evaluation using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37(1):51—55.
- Boone, P. (1996), “Politic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2):289—329.
- Bourguignon, F. & J. P. Platteau(2017), “Does aid availability affect effectiveness in reducing poverty? A review article”, *World Development* 90:6—16.
- Bräutigam, D. (2011),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5):752—764.
- Brazys, S. R. (2013), “Evidencing donor heterogeneity in aid for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4):947—978.
- Brenton, P. & E. von Uexkull(2009), “Product specific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exports: Has it been eff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18(2):235—254.
- Burnside, C. & D. Dollar(1998), “Aid, the incentive regime, and poverty reduction”,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1937.
- Burnside, C. & D. Dollar(2000),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47—868.
- Burnside, C. & D. Dollar(2004),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781—784.
- Cali, M. & D. W. Te Velde(2011), “Does aid for trade really improve trade performance?”, *World Development* 39(5):725—740.
- Carro, M. & J. M. Larrú(2010), “Flowing together or flowing apart: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DI and ODA flows to Argentina and Brazil”, MPRA Paper, No. 25064.
- Chen, S. & M. Ravallion(2007), “Absolute povert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1981—2004”,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211.
- Chong, A. et al(2009), “Can foreign aid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Public Choice* 140(1—2):59—84.

- Clay, E. J. et al(2009), "Untying Aid: Is it wor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Declaration and of the 2001 DAC Recommendation of Untying ODA to the LDCs", Report submitted to OECD.
- Collier, P. & A. Hoeffler(2004), "Aid, policy and growth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 (5):1125—1145.
- Collier, P. & D. Dollar(2002), "Aid allo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8):1475—1500.
- Collier, P. & D. Dollar(2004),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What have we learnt?", *Economic Journal* 114(496): F244—F271.
- Collier, P. & J. Dehn(2001), "Aid, shocks, and growth",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2688.
- Dalgaard, C-J. et al(2004), "On the empirics of foreign aid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14 (496):191—216.
- Davidson, R. & J. G. MacKinnon(1993),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in Econometr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we, D. (1996), "A new look at the effects of export instability 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24 (12):1905—1914.
- Deaton, A. (2013),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jajić, S. et al(2004), "Logic of aid in an intertemporal sett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1):151—161.
- Djankov, S. et al(2008), "The curse of aid",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3(3):169—194.
- Djankov, S. et al(2009), "Aid with multiple personal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2):217—229.
- Dollar, D. & W. Easterly(1999), "The search for the key: Aid, investment and polic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8(4):546—577.
- Dollar, D. & A. Kraay(2002),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7(3):195—225.
- Dollar, D. & A. Kraay(2004),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Economic Journal* 114(493):22—49.
- Donaubauer, J. et al(2014), "Does aid for education attract foreign inves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Latin Ame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6(5):597—613.
- Donaubauer, J. et al(2016), "Aid, infrastructure, and FDI: Assessing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with a new index of infrastructure", *World Development* 78:230—245.
- Dong, Y. & C. Fan(2017), "The effects of China's aid and trade on its ODI in African countries",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33:1—18.
- Dreher, A. et al(2015), "Government ideology in donor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Does ideological proximity matter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9:80—92.
- Dudley, L. (1979), "Foreign-aid and the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4):564—571.
- Easterly, W. (2002), "The cartel of good intentions: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in foreign aid",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5(4):223—250.
- Easterly, W. (2003), "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23—48.
- Easterly, W. et al(2004),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774—780.
- Easterly, W. & T. Pfütze(2008), "Where does the money go? Best and worst practices in foreign ai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29—52.
- Easterly, W. & C. R. Williamson(2011),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The best and worst of aid agency practices", *World Development* 39(11):1930—1949.
- Economides, G. et al(2008), "Does foreign aid distort incentives and hurt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75 aid-recipient countries", *Public Choice* 134(3—4):463—488.
- Edwards, S. (201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yklos* 68(3):277—316.
- Elbadawi, I. A. (1999), "External aid: Help or hindrance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8(4):578—616.
- Faini, R. & A. Venturini(1993), "Trade, aid and migrations: Some basic policy issu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7(2—3):435—442.
- Frey, B. S. & F. Schneider(1986), "Competing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lending activ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225—245.
- Friedman, M. (1958), "Foreign economic aid", *Yale Review* 47(4):500—516.

- Frot, E. & J. Santiso(2008), "Development aid and portfolio funds: Trends, volatility and fragmentation", OECD Working Paper, No. 275.
- Frot, E. & J. Santiso(2009), "Crushed aid: Fragmentation in sectoral aid", Stockholm Institute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09/6.
- Garriga, A. C. & B. J. Phillips(2014), "Foreign aid as a signal to investors predicting FDI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8(2):280—300.
- Gary, A. & M. Maurel(2015), "Donors' policy consist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Kyklos* 68(4): 511—551.
- Gaytan-Fregoso, H. & S. Lahiri(2000), "Foreign aid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3(2):515—527.
- Gnangnon, S. K. (2018), "Aid for trade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recipient-countries", *World Economy* 42(2):396—418.
- Gnangnon, S. K. & M. Roberts(2015), "Aid for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 upgrading in recipient countries",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ERSD—2015—10.
- Gnangnon, S. K. & M. Roberts(2017), "Aid for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 upgrading in recipient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8(2), 1750010, 10.
- Griffin, K. (1978),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and National Poverty*, Palgrave Macmillan.
- Grindle, M. S. (2004), "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ance* 17(4):525—548.
- Guillaumont, P. & L. Chauvet(2001), "Aid and performance: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6):66—92.
- Guillaumont, P. S. et al(1999), "How instability lowers African growth",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8(1):87—107.
- Hansen, H. & F. Tarp(2001), "Aid and growth regress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4(2):547—570.
- Harms, P. & M. Lutz(2006), "Aid, governance and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Some puzzling findings for the 1990s", *Economic Journal* 116(513):773—790.
- Helble, M. et al(2012), "Aid-for-trade facilitation",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8(2):357—376.
- Hien, P. T. (2008), "The effects of ODA in infrastructure on FDI inflows in provinces of Vietnam, 2002—2004", Vietnam Development Forum Working Paper, No. 89.
- Hoekman, B. & S. Prowse(2005), "Economic policy responses to preference erosion: From trade as aid to aid for trad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3721.
- Hühne, P. et al(2014a), "Who benefits from aid for trad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n recipient versus donor expor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0(9):1275—1288.
- Hühne, P. et al(2014b), "Aid for trade: Assessing the effects on recipient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and primary commodities to donors and non-donor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 1953.
- Johansson, L. M. & J. Pettersson(2009), "Tied aid, trade-facilitating aid or trade-diverting aid?", Uppsal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09/5.
- Kang, J. S. et al(2012), "Aid, exports, and growth: A time-series perspective on the Dutch disease hypothesi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3(2):1—26.
- Kapfer, S. et al(2007), "If you build it, will they come? Foreign aid's effec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65th MPSA National Conference.
- Kapur, D. (2004), "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 G—24 Discussion Paper, No. 29.
- Karakaplan, U. et al(2005), "Ai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Turkish Economic Associ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12.
- Kemp, M. C. & S. Kojima(1985), "Tied aid and the paradoxes of donor-enrichment and recipient-improve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3):721—729.
- Kihara, T. (2012), "Effective development aid: Selectivity, prolife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and the growth impact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DBI Working Paper, No. 342.
- Kilby, C. & A. Dreher(2010), "The impact of aid on growth revisited: Do donor motives matter?", *Economics Letters* 107(3):338—340.
- Kim, R. Y. (2017), "Does aid for trade diversify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recipient countries?", WINPEC Working Pa-

- per Series, No. E1710.
- Kim, S. K. & Y. H. Kim(2016), “Is tied aid bad for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53:289—301.
- Kimura, H. & Y. Todo (2010),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38(4):482—497.
- Kimura, H. et al(2012), “Aid prolif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40(1):1—10.
- Knack, S. (2001), “Aid dependence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Cross-country empirical test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8(2):310—329.
- Knack, S. (2004), “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1):251—266.
- Knack, S. (2013), “Aid and donor trust in recipient country syste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1:316—329.
- Knack, S. & A. Rahman(2007), “Donor fragmentation and bureaucratic quality in aid recipie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1):176—197.
- Knack, S. & L. Smets(2013), “Aid tying and donor fragmentation”, *World Development* 44(1): 63—76.
- Kosack, S. (2003), “Effective aid: How democracy allows development ai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World Development* 31(1):1—22.
- Kosack, S. & J. Tobin(2006), “Funding self-sustain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aid, FDI and government in economic suc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1):205—243.
- Kristjánssdóttir, H. (2006),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id”, University of Iceland, Working Paper.
- Kruse, H. W. & I. Martínez-Zarzoso(2016), “Transfers in the gravity equation: The case of foreign aid”, CEGE Discussion Paper, No. 288.
- Kurlantzick, J. (2006), “Beijing’s safari: China’s move in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id,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orking Paper.
- Lahiri, S. & P. Raimondos(1995), “Welfare effects of aid under quantitative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9(3—4):297—315.
- Larmer, B. (2017), “Is China the world’s new colonial power?”, *New York Times*, May 4th.
- Lemi, A. (2017), “Aid for trade and Africa’s trad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bilateral trade flows with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African Trade* 4(1—2):37—60.
- Lengauer, S. (2011),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Motive and method”, *Culture Mandala: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 Economic Studies* 9(2):35—81.
- Lensink, R. & H. White(2000), “Aid allocat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assessing aid repor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3):399—412.
- Lensink, R. & H. White(2001), “Are there negative returns to ai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6):42—65.
- Levy, V. (1988), “Aid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recent experi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9):1777—1795.
- Liu, A. & B. Tang(2018), “US and China aid to Africa: Impact on the donor-recipient trade rela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1):46—65.
- Martínez-Zarzoso, I. et al(2009), “Does German development aid promote German exports?”,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0(3):317—338.
- Martínez-Zarzoso, I. et al(2017), “Is aid for trade effective?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1(4):175—203.
- Masud, N. & B. Yontcheva(2005), “Does foreign aid reduce pover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ongovernmental and bilateral aid”, IMF Working Paper, No. 100.
- McKinley, R. D. & R. Little(1979), “The US aid relationship: A test of the recipient need and the donor interest models”, *Political Studies* 27(2):236—250.
- Meyersson, E. et al(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in Africa”,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 Organisatio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 Minasyan, A. & P. Nunnenkamp(2016), “Remittanc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3):681—701.

- Minasyan, A. et al(2017), “Does aid effectiveness depend on the quality of donors?”, *World Development* 100:16—30.
- Minoiu, C. & S. G. Reddy(2010), “Development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A positive long-run relation”,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50(1):27—39.
- Mody, A. et al(2003),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driving FDI flows: Host-country transparency and source country speci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9662.
- Morgan, P. & Y. Zheng(2018), “Tracing the legacy: China’s historical aid and contemporary invest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3(3):558—573.
- Morgan, P. & Y. Zheng(2019), “Old bottle new wine?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id in Africa 1956—2014”, *Third World Quarterly* 40(7):1283—1303.
- Mosley, P. et al(1987), “Aid,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marke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97(387):616—641.
- Mosley, P. et al(2004), “Aid,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new conditionality’”, *Economic Journal* 114(496):F217—F243.
- Moyo, D. (2009),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Macmillan.
- Munemo, J. (2011), “Foreign aid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3):339—355.
- Munro, L. T. (2005), “Focus-Pocus?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whether aid organizations should do fewer things in fewer countr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3):425—447.
- Nowak-Lehmann, F. et al(2009), “Aid and trade—A dono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7):1184—1202.
- Nowak-Lehmann, F. et al(2013), “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recipient exports to donor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9(3):505—535.
- Oduor, J. & D. Khainga(2009),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Kenya”,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Working Paper, No. 34.
- Olson, M. & R. Zeckhauser(1966),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3):266—279.
- Opoku-Mensah, P. (2009),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syste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albor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No. 16.
- Osakwe, P. N. (2007), “Foreign aid, resources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Africa: A new test of existing theories”, MPRA Paper, No. 2228.
- Page, J. & A. Shimeles(2015), “Aid, employ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7(S1):17—30.
- Page, J. & M. Söderbom(2015), “Is small beautiful? Small enterprise, aid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7(S1):44—55.
- Pehnelt, G.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aid policy in Africa”,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No. 51.
- Pettersson, J. (2007), “Foreign sectoral aid fungibility,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8):1074—1098.
- Pettersson, J. & L. Johansson(2013), “Aid, aid for trade, and bilateral trade: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2(6):866—894.
- Rajan, R. G. & A. Subramanian(2005), “What undermines aid’s impact o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657.
- Rajan, R. G. & A. Subramanian(2008), “Aid and growth: What does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really show?”,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513.
- Rajan, R. G. & A. Subramanian(2011), “Aid, Dutch disease, and manufacturing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1):106—118.
- Ramey, G. & V. Ramey(1995),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5):1138—1151.
- Ravallion, M. & S. Chen(1997), “What can new survey data tell us about recent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2):357—382.

- Rogerson, A. (2005), "Aid harmonisation and alignment: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Paris reform agend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3(5):531—552.
- Samuelson, P. A. (1952),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The terms of trade when impediments are absent", *Economic Journal* 62(246):278—304.
- Samuelson, P. A. (1954),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II: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 *Economic Journal* 64(254):264—289.
- Sautman, B. & Y. Hairong(2007),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75—114.
- Selaya, P. & E. R. Sunesen(2012),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40(11):2155—2176.
- Silva, S. J. & D. Nelson(2012), "Does aid cause trade? Evidence from an asymmetric gravity model", *World Economy* 35(5):545—577.
- Simpassa, A. et al(2015), "Employment effects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support: The case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7(S1):31—43.
- Suwa-Eisenmann, A. & T. Verdier(2007), "Aid and trad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3(3):481—507.
- Svensson, J. (2000), "When is foreign aid policy credible? Aid dependence and condition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1(1):61—84.
- Tavares, J. (2003), "Does foreign aid corrupt?", *Economics Letters* 79(1):99—106.
- Taylor, I. (2009),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Temple, J. & N. Van de Sijpe(2017), "Foreign aid and domestic absor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8:431—443.
- Todaro, M. P. & L. Maruszko(1987), "Illegal migration and US immigration refor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1):101—114.
- Tresselt, M. T. & M. A. Prati(2006), "Aid volatility and Dutch disease: Is there a role fo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MF Working Paper, 6(145).
- Vijil, M. & L. Wagner(2012), "Does aid for trade enhance export performance? Investiga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nnel", *World Economy* 35(7):838—868.
- Wagner, D. (2003), "Aid and trade: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7(2):153—173.
- Woods, N. (2008),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6):1205—1221.
- Yasin, M. (2005),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17(1):23—40.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AN Guanghua ZHU Meihua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As the amount of ODA continues to rise with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joining as donors, the issue of ODA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literature survey focuses on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ODA, emphasizing its impacts on growth, trade, FDI, poverty, employment, welfare and cross-border migration. The survey ends with discussions on some of the pending research issues, and the emerging literature on China's aid. Our survey suggests reforming ODA policy and modality to improve its effectivenes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Aid; ODA; Growth; Trade; FDI; Poverty Reduction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